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叶君健卷

重返书房

冬天狂想曲

小仆人

小厮辛格

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

十九世纪北欧文学

世界语文学

谈文学作品翻译



华文出版社



C53

53
A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叶君健卷

叶君健 著
周靖 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方舟,雪夫主编;
叶君健著;周靖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9

ISBN 7-5075-0728-9

I. 东…

II. ①方… ②雪… ③叶… ④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③叶君健—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02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密 云 胶 印 厂 印 刷

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63044503)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0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

- 3 “向后看”
- 6 我的故乡——红安
- 8 我与武汉
- 12 我的外语生涯
- 20 一段与日本的文学因缘
- 25 我写小说
- 28 在武汉“三厅”工作的时候
- 32 想起香港
- 35 1944——1945, 一个文化人在英国……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 48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
- 53 新中国的第一个外文刊物
- 60 翻译毛泽东诗词

- 65 重返书房
- 69 母亲
- 75 永远的怀念
- 79 老伴
- 84 家
- 87 校志

第二部分 代表作品

- 97 岁暮
- 105 冬天狂想曲
- 150 李琪琛“下海”
- 163 他“以天下为己任”
- 176 竞争
- 182 大款
- 189 新同学
- 203 小仆人
- 214 小厮辛格
- 220 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
- 227 真假皇帝
- 254 十九世纪的北欧文学
- 276 世界语文学
- 285 外国文学研究和创作
- 292 福斯特——现代小说的先驱
- 297 谈谈外国儿童文学
- 307 谈文学作品的翻译

第三部分 游记·随笔

- | | |
|-----|------------------|
| 325 | 天安门之夜 |
| 330 | 香山的红叶 |
| 334 | 塞浦路斯之行 |
| 348 | 丹麦散记 |
| 356 | 重返剑桥 |
| 374 | 澳大利亚之行 |
| 380 | 烟霞晚唱 |
| 382 | 骊歌 |
| 386 | 拄杖无时夜叩门 |
| 389 | 麦收季节 |
| 393 | 树上的小鸟 |
| 395 | 玫瑰花苗 |
| 399 | 题画记 |
| 403 | 附录 |
| | “布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 |

第一部分 自述自传

“向后看”

《八十岁的叶君健，真正当上了作家》。这是1993年12月25日《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有关我的“专访”的标题。那时我已进入80岁，在得了不治之症——癌——后，在家养病已近一年，逐渐恢复了体力。我在每天上午精力较好的时候爬点格子。在这一年，我被批准离休。主要的社会工作，如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的职位也都结束了。我成为“无职一身轻”的自由人，真的可以“当作家”了。事实上我三十年代初期还在中学念书时候，就已经对文学感到兴趣，想当作家，但一直没有“真正”当成。

这是时代造成的。我是个渺小的人，但对人、对国家也有责任感。1931年我正在上海念高中，一天在饭厅吃中饭时，饭厅墙上忽然贴出了学生会的紧急通告：头天晚上日本法西斯军队突袭了沈阳的北大营，驻军按蒋介石的指令不抵抗。接着的几天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占领整个东三省。敌人以这样的速度前进，不到一年就要打到上海了；果然1932年春就发生了“一二·八”事件。我的学校在炮火中被毁掉。我深切的体会到，亡国奴的命运已经悬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开始写些短文，内容主要是抗日及与抗日相联系的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抗战和贪污腐化。

从这些短文的写作实践我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也懂得了一些政治。我的“文艺思想”就被引向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那个方向上去。但我不是作家，不够条件当左联成员。这一年我考进了大学。继续挤出时间为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报刊，用我至今也记不

清楚的许多笔名写杂文,同时也秘密参加学生的一些进步活动,终于我引起了学校特务学生——“蓝衣社”的成员——的注意,我不得不花很多精力来应付他们。作为这样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自然找不到职业。我得到一位朋友资助旅费,买张船票去日本打工——因为我的外语还不错,我找到了一个教英文的工作。

在“西安事变”发生三个多月以后,东京的便衣特务突然在一天五更时分把我抓走,下到我住在地区的监狱。这次班房一蹲就是三个多月。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三个星期把我驱逐出境,罪名是抗日和“具有危险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我到达上海时“八一三”炮火即将爆发。我开始直接投入救亡活动中去。第二年初,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种象征的武汉政治部第三厅(由周恩来同志领导,郭沫若任厅长)吸收我去做对外宣传工作。从此对外宣传就与我结了解之缘,在不同的时期我或有领导或自发地从未中断这种工作,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但我从没有放弃过写作——当然只能用“见缝插针”的方式点滴进行,“业余”地干。

对外宣传——当然是广义的“对外宣传”,也就是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的思想、生活、感情和斗争——就成了我创作的主旋律。我这种创作活动主要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我在大学念书,到我后来去香港、日本和欧洲,直到我1949年秋从欧洲回国止。这个时期我们中国老百姓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使外国人民能听到他们的呼声。所以这个时期我的创作主要是用外文——英文和世界语——写的,在国外出版。这些作品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国家流行,其中有代表性的我过去几年自己译成了中文,供国内读者鉴定。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我作为国家一个对外宣传的外语干部,“见缝插针”地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主要是用中文;因为读者在国内。拉拉杂杂,我写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但我觉得我基本上不是一个作家——虽然我一直盼望当个作家。此外我还在大学学过一项专业——即西欧文学,后来又在剑桥大学继续研究了几年,放弃

不用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在不同时期还在好几个大学当过外文和外国文学的教授，现在仍然挂着好几个大学的“名誉教授”头衔，不时还被邀主持授予博士学位的答辩会或文化方面评高级职称的评议会。至于当对外宣传的外语干部，从1950年起直到最近离休，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作为“作家”连副业都谈不上。

这个局面，上面说过了的，是“时代”的要求所造成。但我不过是时代中的一颗沙粒，得服从时代的制约，个人的意志和“抱负”起的作用实在有限得很。一句话，我始终没有跳出时代的巴掌心。这就规定了我的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它们是“夹缝”中的产物。现在我算基本上解脱了繁忙的公务，比较“自由”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也许我的创作会有点新的发展——尽管我已年过八旬。

1994年6月20日

我的故乡——红安

红安过去叫黄安,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一个叫做倒水河的河边小村里出生,一直到14岁才离开。由于国家长年经受着变乱和战争,此后我一直就在动荡中生活,东跑西奔,甚至在世界的五大洲都留下了足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吸引人之处,我所到过的一些地方现在还不时回到我的记忆中来,使我为之神往,但哪个地方也没有像我的故乡在我的感情中扎下了那么深的根,我永远忘不了它。

我们那个县份很小,假在大别山的脚下,过去不为人瞩目,几乎被遗忘了。正因为如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总觉得它有点像个世外桃源。县北方有像天台山那样的高峰,县南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间由一条宽广的倒水河贯串起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小小世界。我记得春天和夏天常常在倒水河边的沙洲上放牧,到了秋天就在那些丘陵地里摘棉花或捡红薯。冬天枫叶和松针铺满山间,我不时和村童一起去收集它们作为柴火。那是一个“黄安”式的小小世界。这样的世界地球上哪里也找不着。

那里的树木很多,鸟也多。所有的山丘上差不多都有松林,其间夹杂着一些不同类型的灌木、野花和参天的大树——有的据说是种于明代,花香、鸟语、秧歌,使这个锁在山中的小县洋溢着饱满的生命。但秋风一起,它的景色为之一变,枫叶纷纷飞舞,松针在松涛声中簌簌坠落,飞过的雁群在上空发出唳鸣,这些音响交织在一起,更加强了这个地区的世外感。这时气氛虽然有点萧瑟,但具有诗意的

境。可是这里却不像西方人所憧憬的那种“香格里拉”，落后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封建剥削，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始终没有能达到与这里动人的风光相称的地步。因此，当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涌进这个地区以后，这里的农民就立即举起革命的旗帜，纷纷响应。

第二年这里爆发了有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从此革命与反革命、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中间还插进一段相当长的反日本法西斯军队入侵的斗争。这种连续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中国解放。在这长期的斗争中，这里的人民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毅力和决心。大批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们中间涌现了出来。他们对中国的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解放后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仍然在发挥巨大的作用，直到现在。

从地理上看，今天的红安县仍是江山依旧，但景物多了：随时随地人们都可以发现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意义的“历史遗迹”——“古战场”、英雄纪念碑、烈士就义的地点、杰出的将军和革命者的故居。当然永垂青史的是这里人民所创造的革命业绩。这些业绩，对我个人说来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灵感。我曾经根据这里人民斗争的史实写过好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名为《山村》的一部甚至流传到了极辽远的冰岛。冰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拉克斯奈斯为该书冰岛文译本写的序言中说：这种由保守、落后的农民转化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在中国农村中所进行的革命，“连马克思也没有作出过预言”。这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也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所以这个长期封闭在山区里的小县，今天在世界地图上所占的位置，也应该说是相当显要。

我与武汉

在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武汉是很重要的一站——也可以说是两站，甚至三站。这并不是因为我出生在湖北。事实上，武汉对我原很陌生，因为我的故乡是在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小县——红安。小时我没有机会看到武汉，只有和村里的一些玩伴偶尔谈到它——谈得很玄，把它描绘得像是一个辽远异国的首都，心里总渴望着有那么一天能见到它。但只有到了 11 岁的时候，也就是 1926 年，我才真正有机会亲眼看到武汉。那时，北伐的革命军队攻克武昌，这个城市被围了好长一段时间。乡下也流传着许多关于武昌被围的故事，这个城市在我的想象中显得更玄了。但不久又有新的传闻，说那里成了新的革命政府的首都。这是第二年的事。就在这年春节后，当时在武汉搞工会工作的我的一个哥哥，把我接到武汉，让我能学到一点新时代的知识。

我进了一个新式小学，并且被编进了儿童团。学会了唱许多革命歌曲。因为那时活动多，几乎天天有群众游行和群众大会，我经常和儿童团一起去参加，还执行一些任务：维持秩序。那真是一个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我也被当时的那种热烈气氛所陶醉了。

可是风云突变，蒋介石反对革命了。我那个与工会有关的哥哥，为了减轻身边的累赘，又把我送回到乡下来。他自己不久也远走上海，到那里的租界里暂时栖身。但，再到乡下私塾里读“子曰”、“诗云”，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那短暂的两三个月的儿童团生活和武汉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始终在刺激我的想象。但是那种

日子再也没有出现了。乡下事情也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变：成立没有多久的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农民协会的带头人也被抓了，离我们村子不远的河滩上，几乎每天都有种田人被拉去枪毙。我那个谨小慎微与世无争的父亲变得紧张起来。用他那很不容易积攒下的一点钱，把我送到上海，因为哥哥在那里。那是1929年初夏。我又进了一个新学堂，学新知识，以便在城市里谋生。老家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年9月18日，日本军阀一夜之间占领了东三省，当地驻军后撤，不加抵抗。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学校饭厅吃午饭。同学们都大惊失色。那时，左翼文化运动正在上海蓬勃发展，有一位高中同学——也是湖北人，名万迪鹤，后来成了作家——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我决意违背父亲的意愿，不再考虑个人将来的职业，而想做点对国家有用的事。做什么呢？在这个偌大的十里洋场，一个乡下来的少年能做什么？这时父亲也去世了。在第二年初日本军队又攻打上海。我终于病倒了，只好辍学。

这场病一直持续到这年的初秋，病好后，还是只有找机会读书，谋生是没有道路的。但到什么地方去读书？武汉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很新鲜，又开始刺激我的想象。那时到上海招生最晚的一个大学是武汉的华中大学。我勉强去应试，居然被录取了。当我再来到武汉，在这个学校住下来以后，我发现我所惦念的这个城市大大地变样了：它已经失去了活力，空中笼罩着一股沉重的乌云。第二年我转进了武汉大学，离这个城市远了一些，附近还有一个开阔的东湖，水清如镜，给人一种清鲜的田园感觉。但很快我又发现，这里的空气也是同样地沉浊：我在学生中发现了一个模仿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的蓝衣社组织。他们在暗地里制造紧张，使人感到有一种窥伺的眼光在周围恶意地探索。这又引起我的老病复发——神经衰弱。

但这种日子也给人提供新的经验和锻炼。如何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活下去，学习下去，甚至还做点工作，便成了一个新课题。得培养政治的机警性，同时又得抓紧时间读点书，做点事。我按照这个原则

重新调整生活：除了应付学校的功课外，还争取时间私自读应读的书，同时搞创作：用世界语写小说，用中文写杂文，甚至还隐蔽地参加世界语和文化活动。那时出现了一个新出版的报纸《大光报》，孔罗荪是它的副刊《紫光》的编辑。我用了一些我自己现在也记不清的笔名在那上面写了许多杂文，通过这些关系又认识了几位隐姓埋名的文化人，其中之一便是冯乃超。他隔些时候请假去上海一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武汉作为蒋介石的后方，是被控制得那么紧，密探和蓝衣社到处活动，党的组织无法活动，他只有去上海过组织生活。

就是在那样一种阴昏的气氛下，我度过了在武汉的4年学生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这4年虽然是抑郁寡欢，孤寂，加上一定程度的神经紧张，但却也教给了我许多难得的人生知识和有关善与恶、美与丑的界线。我想这对于一个想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值得经受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可以帮助人认识写作的意义。我也就在这里用世界语写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大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第三次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是在1937年末。这个城市又复苏了。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它又变得生气勃勃，成了全国抗战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联合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第一次在这里建立了统一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参加了它的发起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工作，也第一次在这里有了公开的机构：政治部第三厅。我也成了它的一名工作人员，充分利用在那气氛压抑下的大学时期所获得的一点外文知识，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宣传我们的人民如何在反侵略的战火中获得了新生，如何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对世界和平和民主在作出贡献。那是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为了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我自己也处在兴奋状态之中，也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头支持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尽管这段时间与1927年那不到一年的光阴是同样短促，但它对我所起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现在：从那个

时候起,对外宣传几乎成了我很长时期的工作方向。

在武汉撤守的前夕,也就是在 1938 年秋,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再没有回去。屈指算来,光阴逝去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解放以后,我虽然几次在那里经过,但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探寻旧地。事实上它现在已是面貌全非了,曾经一度略带田园风味的珞珈山,现在也已经成了闹市,与武昌联成一气。武汉,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在历史上的位置却是永远不变的。